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摄影

Photography in the War of Chinese Resistance Against of Japan

撰文/杨克林

■ 特别关注 ■ Special Focus ■

提纲

- 一、问题的提出——从图像的视角研究抗战史
- 二、抗战时的摄影观念与取向
- 三、抗战时的摄影机构
- 四、抗战时的摄影刊物和专集
- 五、抗战时的摄影家及其贡献
- 六、抗战时的摄影作品的局限性和误区
- 七、抗战时摄影作品的保存、流传、使用和鉴别
- 八、战时日本对摄影的运用概况
- 九、关于建立抗战图片库及其国家标准的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从图像的视角研究抗战史

二十世纪以来,在历史研究的领域,摄影照片和记录影片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特别是很多反映近现代历史的出版物和影视片中大量使用了摄影作品。以抗日战争的研究来说,从各种出版物的封面到里面的内容,从各博物馆、纪念馆到许多报刊杂志,以及各级电视台的节目,都可以看到很多摄影作品。但是,这些摄影作品主要都作为文字的陪衬和装饰、或作为某一观点的实证,很少把摄影作品或摄影作者作为主体来研究和分析。

摄影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一定时空中过程的瞬间做真实客观的记录。照片所提供的信息以及它的美学价值,无疑给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我们使用摄影作品的过程中,不但缺乏对摄影作品的全面认识,而且往往也忽视了对作者的尊重,忽视了他们背后的重要故事。如:这张照片和这段影视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拍摄下来的,它在整个事件中处于什么时段、什么地位?有什么特点?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那些作者们是怎么工作和拍摄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所处的环境与整个抗日战争的关系是什么?如此等等的问题对我们研究整个抗日战争和中日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

二、抗战时的摄影观念与取向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半期,上海的一家华昌照相材料行办了一本名叫《晨风》的摄影杂志,以晨风摄影研究社名义编辑出版,内容分照片、摄影研究、文艺三个栏目。实际是一本面对广大摄影爱好者的大众刊物。在其第4集的“摄影研究”栏里有一篇名为《献给爱好摄影的青年人们》的文章说:“你们应当知道现在的时代……九·一八,一·二八;甚至以往的五卅、五九事件的发生,明白地告诉你,资本主义的枪口对准了你的心堂,你想,这是甚么时代?……许多血淋淋的事件在我们面前流来……摄影家要用直观来把时代的一切的事实包括在他

的作品里。”并指出只玩弄技巧或唯美的艺术作品,不能给人多大的影响。

一般摄影研究栏目多刊登技术、器材、技巧等方面的文章,但它却刊登政论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刊物只刊登德、美、英的器材广告和华昌自身的广告,唯独不登日本照相材料商行的广告,足见编者的立场以及当时摄影界普遍的观念和取向。

这时(1936年12月1日),在广州举办了一个“沙飞个人摄影展览会”,沙飞还写了一篇《写在展出之前》的文章说:“我学习摄影还未满五年……无论环境怎样恶劣,终不能磨灭我的意愿。因为我觉得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我总想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像的工具。”“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淫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体裁”。当时是九·一八事件已发生近6年,中华民族伟大的全面抗战即将爆发之时,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场巨大的腥风血雨的考验。沙飞的这个展览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他在展览中的一组作品:“国防前线的南澳岛”更普遍引起人们对日本侵略的关注。据当时的会刊记载,沙飞当时正打算拍一套“中国四万万同胞往哪里去?”的大型系列作品。

在当时的电影界,曾经亲自带领摄影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摄下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的黎民伟,在1935年元旦留下这样一则日记:“电影是文化教育伟大的武器,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武器。愿从新年起,希望大家注意电影文化事业;愿从新年起,中国电影发挥最大的威力。”他是以“电影救国”为己任的,他更是一位用摄影的眼光见证时代的人,摄影和抗战就这样联系起来。以上所列举的仅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前夕,而无比宏伟而悲壮的抗日战争的场景即将在中国人民、中国摄影师的面前展开。



《不能忘记的抗战》封面

三、抗战时的摄影机构

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关内步步吃紧,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民众关心国事,渴望目睹时局的演变,因而报纸、杂志和时事性刊物都加强了摄影报道,许多会摄影的人顺乎时代的需要,纷纷组建摄影机构,到三十年代初期已达数十家之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东北新闻影片社,中国新影社,新闻摄影社,中国新闻摄影社(中国社),北洋新闻社,新声摄影社,焕章新闻社,民觉社,国际社,东亚摄影通讯社,江西社,华东社,华北新闻摄影社,国民社,武汉社,长江摄影社,津东社,民声摄影通讯社,南中国摄影社,民众社,东北摄影社,全球社,中国摄影社,绥远通讯社,中联社,世界航空新闻社,中外新闻社,嘉兴社,燕清社,西北新闻社,时事社,绥东社,湖南时事新闻社,广西社,广西民众社,远东社等等。

这些机构的业务范围有所不同,一类是专门摄取和提供新闻照片的通讯社,如中国摄影社;一类是既发文字新闻稿又发时事照片的新闻机构,如中外新闻社等。从地区分布看,不仅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文化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建立了新闻通讯机关,就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如南昌、长沙、唐山以及比较落后的绥远、广西等地也组织了新闻社,发布新闻照片。

除上述独立的摄影通讯机构外,少数报纸和画报也建立了自己的摄影组织,如申报新闻摄影社,时报摄影社,良友新闻摄影社,西京日报摄影部等。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进行合作。当时具有影响的有国民党中宣部成立的国际宣传处摄影科、中央通讯社摄影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摄影宣传部门、励志社的电影科、全民通讯社以及武汉新闻摄影社、中国新闻摄影社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各国在重庆及大后方各大城市分别建立了新闻处,中国也积极配合盟国的摄影宣传工作。当时,除了原来的新闻摄影机构外,还有中、美、英三方联合举办的“联合国影闻宣传处”、重庆《联合画报》社、《大战画集》社、《星岛画报》社等12个新闻摄影机构。在那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各摄影机构和摄影工作者们经常举办各种抗战摄影展览。其中,中国还先后在英国、美国、苏联和荷兰等许多国家举办了介绍我国艰苦抗战的摄影展览,为中国抗战赢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和各国人民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当时由董显光、曾虚白负责的国际宣传处在对外发行的大批宣传品中,照片就有3万多张。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曾正式规定在部队文教部门中设立图片摄影组织。各级部队首长都很重视这一工作,经常予以指导。为了解决专业干部问题,还不断举办摄影干部训练班,抽调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及文化教员、宣传员等进行专门训练,在部队中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摄影网,对图片摄影工作的开展给予组织上的保证。这些机构和组织除了供照片给部队宣传教育外,还向国内外报刊发稿,据统计发稿量达五万张(1937—1948)。

四、抗战时的摄影刊物和专集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我国摄影事业和摄影艺术深受挑战。“九·一八”和“一·二八”两大事变,使中华民族加速猛醒,人们亲身体会到不起来抗战势必国家不保,民族沦亡。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摄影界从兴趣主义、唯美主义迅速走向了现实主义。到了七·七和八·一三事变的时期,一切不适应抗战需要的思想意识、表现方法连同那些不合事宜的刊物、画报一一被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盛极一时的抗战摄影画报和专集。以上海为例,三十年代前期出版的摄影专集如下:

名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中日甲午战争摄影集	良友	1931年
日本侵略东北真相画刊	良友	1931年
黑龙江战事画刊	良友	1931年
锦州战事画刊	良友	1932年
上海战事画刊	良友	1932年
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	文华	1932年
热河血战画史	文华	1933年
九·一八国难纪念	良友	1933年
榆关战事画刊	良友	1933年
华北战事画史	文华	1933年
淞沪抗日画史	时事社	1933年
东北巨变血泪大画史	时事社	1933年
古北口回忆	良友	1934年
中国现象-九·一八以后的中国画史	良友	1935年

以上摄影集或名画刊或名画史,都是带有史料性文献性的图书,其用意在于给读者提供系统的图片史料,其内容多半是在画报上发表过和少数没有发表的时事照片。例如《中国现象一九·一八以后的中国画史》即是“九一八”以后到1934年底,历年在《良友》上刊登的新闻照片,选其具有重要意义者,每个题目刊用若干幅。这样让读者可以集中地看到那段时间的大事,不像定期画报上那样零星分散,便于保存,这是摄影集的长处。

同样以上海为例,“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上海除《良友》、《中华》两种大型画报外,还出现了十余种专门以战事新闻为题材的摄影画报。如《抗敌画报》、《血战画报》等等,其特点是刊期短(三日刊、五日刊),开本以16开网线版印刷的为多。这种摄影画报突然增多,充分反映了民众对画报的迫切需要。当时上海出版的刊物情况列表如下:

“八·一三”战争时期上海的摄影画报

名称	刊物	起讫年月	出版数	出版者
良友画报	月刊	26/1-41/10	1-171	良友
中华图画杂志	不定期	30/7-41/8	1-104	中华图画杂志社
少年画报	月刊	37/4-41/9	1-40	商务印书馆
良友战事画报	五日刊	37/8-37/11	1-19	良友
抗战画报	三日刊	37/8-37/10	1-29	抗战三日刊社
抗日画报	周刊	37/9-39/11	1-15	新生出版社
抗敌画报	周刊	37/9-39/11	1-14	抗敌画报

战时画报	五日刊	37/9-39/11	1-20	中华图画社杂志社
血战画报	五日刊	37/10-37/11	1-7	血战画报社
胜利画报	月刊	37/10-37/12	1-3	大同出版社
抗日战事画刊	号外	37/7/31	1	时代画报社
大抗战画报	旬刊	37/10-37/11	3	大抗战画报
抵抗画报	五日刊	37/10-37/11	1-2	抵抗画报
战声画报	五日刊	37/10-37/11	1-10	战声画报社
战时生活画报	五日刊	37/10-37/11	1-10	健康生活社
辛报战情画刊	周刊	37/10-37/11	1-5	辛报社
总动员画报	半月刊	37/11	1-2	总动员画报

以上资料可能有遗漏或误差,但可以看出:

- 大多摄影刊物的出版,集中在1937年8月~11月。这段时间就是淞沪会战的时期[淞沪会战结束后,我军西撤,有些画报仍在“孤岛”继续坚持出版,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结束];

- 刊物的出版期较以前的为短,周刊及三日刊、五日刊占三分之二;

- 这段时间出版的刊物全是民办的,具有要出就出要停就停的灵活性;

- 这批刊物虽然在上海出版,但却是全国发行。

1938年7月,抗日战争进行到第二个年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共产党人的具体负责下,收集了140多幅照片,分别用“烧、杀、炸、奸、劫”为题,出版了《日寇暴行录》,至今仍具有文献价值。

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伴随着它的艰苦和残酷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同样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在敌后战斗频繁,环境艰苦,物资缺乏的条件下,于1941年5月正式创办并坚持出版至抗战胜利的《晋察冀画报》。他的创始人就是沙飞。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司令员聂荣臻曾指示说:“《晋察冀画报》的编辑方针,应该是把边区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光辉事迹反映出来,以鼓舞人民更勇敢的斗争。我们的画报不仅要面对边区,而且要面对全中国,全世界”。

在该画报的创刊号上,即反映了边区军民坚持抗战和建设敌后根据地等各方面的情形。如:大龙华歼灭战;黄土岭战斗;陈庄战斗;百团战斗;狼牙山战斗;外宾访问边区;白求恩抢救伤员;八路军向塞外挺进等150多幅作品。对于《晋察冀画报》和沙飞,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贡献则是他们对摄影底片的重视。他们规定“人在底片在,一人倒下,另一人背起。保证不损坏,不遗失。”沙飞和他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完整地保存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8年来拍摄的数以万计的照片底片,这是中华民族具有历史价值的珍贵财富。

五、抗战时的摄影家及其贡献

中国摄影界自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后,通过摄影图片、画报、影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和军事侵略,不断进行了报道和揭露,在广大民众中留下了日本侵略者残暴罪恶的形象。在摄影界的思想意识方

面,三十年代中期曾有人提出“国防摄影”的响亮口号,要求把摄影题材转到“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努力”的方向上来。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摄影家和摄影工作者。这里首先值得一提的王小亭。在二三十年代的摄影记者,他是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前高凡曾称他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摄取了大量有历史意义的新闻照片,建树颇丰。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时,作为万国新闻记者的王小亭前往济南摄影,受到日军监视,但他不顾危险摄取日军暴行的镜头,其中有被日军残杀的我同胞尸体的照片10余幅。这组难得的新闻照片后来刊登在《良友画报》第26期上。

王小亭于1900年生于北京,早年任职于英美公司电影部,做了两年的摄影师,是中国人投身于电影界的鼻祖。后来受万国新闻通讯社的聘请,任该社摄影记者。“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到了东北锦州前线摄影,察哈尔、绥远、热河等地都留下他的足迹。王小亭的作品很多,散见于《良友画报》、《申报》、《世界画报》、《时代画报》、《北晨画报》、《战时画报》、《大众画报》等很多种刊物。“八·一三”抗战开始后,他在上海火车站南站拍的一个小孩坐在被炸毁的月台上大哭的照片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美国1855年至1960年间发表的最优秀的新闻照片之一。照片发表后引起国际反应,美国对日本杀戮无防御能力的男女老幼一事提出抗议。这就激怒了日本人,诬蔑他的照片是假的,并悬赏通缉他,王小亭被迫携家逃到香港。1981年3月9日在台北逝世。

与王小亭同一时代的另一位任职于中外通讯社和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方大曾曾在绥远前线采访,活跃于长城内外。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又在前线摄影,特别是见证了《血战居庸关》的战斗。但不久他就消失了,时年才25岁。是全面抗战后第一个为国捐躯的摄影记者。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全国各地的摄影记者和摄影爱好者已开始活跃。如1935年初,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三名青年学者沈逸千、俞创硕、顾延鹏组成“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一面摄影,一面举行“国难画展”(内有摄影照片)。他们到华北、西北、蒙边旅行宣传达14个月。到“八·一三”事变前夕,沈逸千等三人再次组成“战时摄影服务团”赶赴华北、大西北进行摄影采访,以“战影团”名义在上海画报上发表新闻照片。回到上海后,于10月15日起在青年会举行“战时摄影第一届影展”。其中,俞创硕拍摄的反映忻口会战的照片尤为珍贵。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上海的摄影记者更为活跃。如王小亭、俞创硕(良友)、向慧庵、蔡述文(国际社)、马廉伯(新闻报)、吴宝基(时事新报)、黄宇民(中国新闻摄影社)、卓世杰、何汉章等人。从战争开始到1937年11月中旬战争告一段落,拍了不少战时新闻照片。

随着淞沪会战的落幕和全国大迁徙的进行,1938年的武汉是大部分摄影家的集散地。如郑景康在武汉主持国际宣传处摄影科,国际社的向慧庵、陈西玲、蔡述文和



(上、下)在日本收集的照片

《良友》的俞创硕、顾延鹏先后参加1938年6月在汉口成立的中央社摄影部,沈逸千参加了在太原成立的全民通讯社,席与群则成为了汉口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的摄影记者。漫画家兼摄影编辑叶浅予也到汉口参加了三厅工作

并转赴香港负责编辑《今日中国》画报。

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部队中建立了摄影工作者的网络。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家主要有沙飞、罗广达、石少

华、雷烨、田野、郑景康、赵烈、苏静、郝世保、康矛召、邹健东和薛伯青等人。他们不但自己摄影,还举办学习班等培养了一大批摄影工作者分赴各抗日前线,以摄影为武器进行战斗。当时冀中军区开办摄影训练班时有一首班歌,是这样唱的:

我们是摄影工作者
带着我们的武器,
走进人群去,奔驰战斗里。
把人民喷怒的心火和子弟兵的胜利,
摄进镜头;
把敌人的暴行和无耻,
印成千万张照片昭示国人。
……

在长达14年的抗战年代里,中国的摄影家和摄影工作者不但背负着历史的重任,而且也同样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其中许多人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除了前面提到的方大曾外,仅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所知的就有韩金生、荣启明、高明、雷烨、赵烈、陈明才、何重生、陆续、孙谦、石震才、李明、张梦华、李文治、韩拴仓、吴亚夫、李乃、刘占奎、何博学、库相波、杨振奎、孟振江、宋谦、李光耀等人。他们和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摄影工作者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一样永垂不朽!

六、抗战时期摄影作品的局限性和误区

摄影、照相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当时作为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贫穷的中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品。和当时的日本相比,日本不但是一个能大量制造枪炮武器弹药,而且是一个能够生产照相机等精密器材的国家。应该说,在这方面也同武器一样,中国处于劣势,并且在日本侵略者的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当时就是进口这些物资也相当困难。另一方面,能使用照相机的摄影工作者也是家庭环境较好且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相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也属于绝对的少数。例如,就抗战中进行的22次大的会战来说,目前能看到的照片反映的不足一半,而且就是有也往往不够全面。应该说,在我国的抗日战争中有无以计数的撼天地,泣鬼神的无以伦比的壮烈场景没有被胶片记录下来。没有留下永恒的瞬间,这是永远的遗憾。这固然与参战部队对这方面的重视有关,但摄影器材和人员的匮乏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在文字叙述需要形象资料补充的时候,用照片往往是代用的办法。最常用、最普遍的办法之一就是日本方面的照片,这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成立,但是显然缺乏中国抗战的主体性,容易让人误解,容易认为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且不说日本方面的照片很多是经过导演、摆布以作宣传之用的,不真实的。因此,这不能不是一个使人警惕而又容易使人踏入的误区,这

个问题至今没有引起足够注意。

七、抗战时摄影作品的保存、流传、使用和鉴别

应该说,气壮山河的全民族参加的伟大抗日战争是应该有相当可观的摄影作品留下记录的。但是,抗日战争作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反侵略战争,在战争胜利后,两党合作破裂,接着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使相当一部分抗战时期的摄影作品,包括作为她载体的摄影专集、画册、刊物等遭到了灭顶之灾。

笔者在编辑《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的过程中得知,不但许多亲历者无法保存这方面的照片(主要指国民政府主导的正面战场的资料),甚至连烈士的家属都无法保存其父母亲的一张肖像。这种惨况使中华民族的子孙,永远愧对她流血牺牲的先辈。这种状况,使得人们在审视整个抗日战争的巨幅画卷中留下许多的遗憾!同时也使得许多出版物、记录影片在涉及这方面内容时而采用的照片显得粗糙、勉强,甚至有张冠李戴的情况。

显然,在另一方面,反映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照片,虽然为当时的恶劣环境和物资匮乏所限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由于保存完好,并经过多年的整理、鉴别、建档。不能不说是比较系统的、高质量的,成为能够反映这方面历史面貌的宝贵财富。如《晋察冀画报》社的全体同志在其领导人沙飞视底片如生命的表率作用下,用生命和鲜血保存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近4万张底片,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

八、战时日本对摄影的运用概况

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早就使用摄影图片这一手段。远在“九·一八”之前,它已在我国东北、华北和华北出版画报、画册和图书。其中有一个名叫岛崎役治的日本情报人员还专门拍摄中国的照片给日皇过目。而他的首席赞助人就是主张“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七·七”事变以后,据初步调查,日本人编印的中文画报就有《日本大事变画报》、《亚细亚画报》、《大陆画报》、《东光》、《战线》、《现代日本》等多种,用来配合军事侵略,进行奴化教育。用日文出版的摄影专集、画报则为数更多。日本军方在编辑的一本画册中明确地说:“形成战争核心的是武力战;而扩大武力战效果的可说是经济战、思想战、宣传战。尤其宣传战涉及的影响很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日本不但在各部队中都配备了设备齐全的摄影报道班,系统全面地进行战场报道,而且把摄影作为一种收集中国情报的手段,鼓励其国内的摄影力量(包括专业的和业余的)全方位地、战略性地扫描中国,从摄影图像的角度来看,更可以证实日本是如何老谋深算,处心积虑地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

至于日本在摄影方面采用各种卑劣狡猾手段,以及在摄影作品的发表、加工等方面的阴谋和审查制度方面,最

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不许可”照片。

在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国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的同时,日本军部向一切相关部门发出“将可能成为战争审判的资料烧毁”的命令。据日本服部卓四郎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披露:当日本决定投降之际“在陆军中央官厅所在之东京市谷区之高台上,开始烧毁机密文件。终战之圣断颁布以后,参谋本部总务课长与陆军省高级副官,曾对全部陆军部队发布烧毁机密文件之遵命通牒。东京市谷区之焚书,其黑烟,自8月14日午后一直继续至16日。”当时,日本《每日新闻》社大阪本社摄影部长高田正雄说:“同事们豁出性命拍来的宝贵史料照片能烧毁吗?”他在摄影部部分人员帮助下,将这些底片剪贴并装箱,藏匿在该社地下贵重品仓库的底层,终于使这批资料得以保存。这些资料主要就是今天已经出版的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期“不许可”发表的照片。

这照片都出自日本《每日新闻》社当年的随军记者之手。每一张照片都盖上了“不许可”或者“检阅济”的红色大印,“不许可”,即“不准”;“检阅济”,即“审阅通过”。凡盖有“不许可”者,一律不准发表。当年盖这些印章的人,都是日军的陆军、海军、内务省和情报局的审查官。

日本执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使许多日军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经审查后被销毁或秘藏,可以想象,他们掩盖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和多少令人发指的暴行!当年保护这些资料的《每日新闻》社大阪本社摄影部的人员,以及今天敢于出版这些资料的日本朋友,他们是日本民族的良心所在。

“不许可”照片可以作为一个象征,象征着已被淹没的历史的一页碎片。

此外,日本在侵略中国期间,还利用汉奸来从事摄影宣传活动。如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采用的方式就有如下种种:

- 日本同盟社派摄影人员到沦陷区和前线摄影采访。
- 汪伪组织在南京成立“中央电讯社”,向上海和其他地方发布新闻照片,在汉奸报纸上刊登。
- 利用文化汉奸出版摄影画报,其中以北平、上海最多。
- 举办摄影展览会。

仅汉奸和伪组织在上海孤岛沦陷前后办的画报就有5种:《青年良友》(40/3-42/7)、《国民新闻画报》(41/10-42/3)、《摄影新闻》(42/1-42/2)、《太平》(42/8-45/5)、《中华画报》(43/8-44/5)。另外还有法西斯德国办的《远东画报》(后改为《欧亚画报》)。

九、关于建立抗战图片库及其国家标准的建议

毛泽东曾说:“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摄影就是这一惊天动地伟业的历史见证。我们永远怀念为后代留下这些永恒瞬间的摄影前辈和国际友人。

然而,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些抗日图片有的正在



云南国殇墓园

流失、损坏和未被重视;有的亟待鉴别和考证;有的被反复拷贝使用,已经失去原来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的空白空间,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和收集这方面的摄影作品。

我建议设立一个国家级的抗日战争图片库,有系统地征集和收集这方面的图片资料,并设立图片质量的标准,对图片的作者、拍摄时间、地点及内容等方面尽可能地进行考证、鉴别和鉴定。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多年了,前辈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瞬间,我们要让它世代永远永恒。

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和中国抗战的永恒瞬间,永垂不朽。

主要参考文献:

- 1、《中国摄影史1840—1937》胡志川、马运增主编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
- 2、《中国摄影史话》伍素心编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 3、《上海摄影史话》上海摄影家协会、上海大学文学院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
- 4、《沙飞纪念集1912—1950》顾棣、宋富盛主编 海天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 5、《铁血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王雁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 6、《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文履平、肖鸣锵编著 重庆出版社
- 7、《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苏光文、吴勇、吴文华、曹植平编著 重庆出版社
- 8、《一亿人的昭和史—(10)不许可写真史》(日)每日新闻社1977年1月1日第一版
- 9、《不许可写真1》(日)编集长西井一夫 每日新闻社1998年12月30日第一版
- 10、《不许可写真2》(日)编集长西井一夫 每日新闻社1999年1月10日第一版
- 11、《窥伺中国—20世纪初日本间谍的镜头》乌丙安、李家巍主编 辽海出版社